



## Time Consciousness in Social Governance

Zhang Kangzhi

**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opera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has led to the scarcity of time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ck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ime in social governance is also one of reasons for the scarcity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e of time, people see two kinds of time: one is natural time; the other is social time. Social time is the time for people to develop and use. It com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time and is a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In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ime, people have been employing many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me resources so as to put the value of time resources to better and better use. Although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time is as old as human history, people's time consciousness began to be awakened roughly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is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t as systems of division-collaboration emerged, so di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me resources. However,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oper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has led to the scarcity of time resources, and such scarcity has in turn continuously prompted people to striv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resources through engineering and social technologies, thus entering a process of upward cycling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scarcity of time resources. The scarcity of time resources constantly strengthens people's time consciousness. If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it was mainly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direc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me resources and if the public sector took measures only in response to the calling of the private sector, today, in an era when time resources are increasingly scarce,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also actively develop and utilize time resources. This new situation requires that social governance develop and raise time consciousness, full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ime resources and recognizing that social time is functionalized tim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oper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in a society that is highly complex and highly indeterminate,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administrators voluntarily and actively arrange matters of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time. Moreover, thi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and it should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onscious reform ac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social time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we may seek a new way of reconstructing models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time consciousness, natural time, social time

**Author:** Zhang Kangzhi received his master's and doctorate in philosophy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1989 and 1995, respectively, and in 2007, he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the "Changjiang Scholar" by the Stat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is currently a senior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philosophy of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Seeking an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volution of Community*, *On Ethical Spirit,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Its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tivism*.



# 社會治理中的時間意識

張康之



**[摘要]**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引發了時間資源的稀缺。同時，社會治理缺乏時間意識，也是造成時間資源稀缺的原因之一。從時間結構來看，人們擁有兩種時間：一種是自然時間；另一種是社會時間。社會時間是從自然時間轉化而來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是人們開發和利用的時間。在時間的利用、管理中，人們掌握了許多時間資源開發和利用的策略，使得時間資源的價值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發揮。雖然社會時間的生成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人的時間意識大致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開始覺醒的。正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隨着諸如分工—協作體制的出現，開始了對時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然而，在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化的條件下，時間資源呈現出了稀缺

狀態，這又反過來促使人們努力通過工程的、社會的技術去不斷地提升時間資源開發的力度，並進入了時間資源開發和時間資源稀缺的循環升級過程中。時間資源的稀缺化，使得人們的時間意識日益增強。如果說近代以來主要是私人部門較為注重時間資源的開發利用、公共部門更多是在私人部門推動下採取回應式行動的話，那麼，在今天這樣一個時間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代，公共部門也需要主動地開展時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需要在此條件下擁有和提升時間意識，充分認識到時間資源的重要性，認識到社會時間是功能化的時間。在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的條件下，在社會的高度複雜性、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需要社會治理者自覺主動地根據社會時間的功能去進行社會治理事項的安排。而且，這應當成為現時代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路徑，也應當成為改革行動中的一個重要的自覺維度，進而在社會時間意識的引領下，尋求社會治理模式重構的可能性出路。

**[關鍵詞]**社會治理 時間意識 自然時間 社會時間

**[作者簡介]**張康之，1989年、199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分別獲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7年被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行政哲學與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共同體的進化》《論倫理精神》《合作的社會及其治理》《公共行政的行動主義》等。

自電報、電話、電視進入人類日常生活後，人們關於時間與空間的感覺就被現代通信技術改變了；特別是通過視頻的交流互動，就連表情也不會缺席，使得時間和空間被壓縮到面對面的互動場景之中。這種“空間革命”，實際上是時間技術的革命，是節時的技術突破了自然時間的約束和限制而讓人把遙遠的地方拉倒了眼前。但是，在工業社會的征服模式中，這種空間的濃縮祇不過是人藉由速度（機械的、電子的）而實現的對空間的征服。按照人征服了自然就能實現解放的思維邏輯，這也應被理解成人的解放的一部分。然而，對人而言，這僅僅是解放了屬於人的時間。它的實質性內涵，是對社會時間的開發，使人所擁有的社會時間總量得到了增加。隨着空間被壓縮，地球變成了村落，空間中的存在物也因為空間的壓縮而變得稠密。在原先的自然空間中，那些因為距離而毫無關係的人，現在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繫，每個人都處在與其發生關係的人的數量倍增過程中，而每一種關係的處理又都意味着時間支出。所以，雖然在空間壓縮中開發出了大量的社會時間，但每一個人卻都強烈地感受到時間資源的稀缺。這一時間與空間發生改變的社會，要求人們的一切活動尤其是社會治理，確立起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時間意識，那就是，隨時準備開發和利用時間資源，把對時間的管理看作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

## 一 社會加速化與時間資源稀缺化

在數字化時代的今天，人們深切體會到的是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當然，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的動因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複雜的，但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無疑是一個主要驅動力。“在信息傳輸中所實現的即時水平，幾乎對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領域都發揮了強有力的加速吸力的作用……其中所產生的速度不再是以令人窒息的‘齒輪嘒嗒嘒嗒轉動’作為象徵的前進了，而是通過互聯網和諸如‘即時滿足’和‘即時供貨’這樣的關鍵詞來加以表述。因而，（例如在開發模塊時）物質過程的可視化和數字化，以及在‘模擬的’也就是物質的過程鏈條中的數字信息傳輸，同時導致了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和消費領域的加速。”<sup>①</sup>“三維打印”（3DP）技術的應用，甚至把工業品運輸的時間也節省了下來，它正在成為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器的“主引擎”。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時間的商品化，啓動了工業和生產的機制，瓦解了階級分化社會中特有的城鄉分化。……伴隨着時間的轉型，空間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種特徵鮮明的‘人造環境’，表現出現代社會中一些新的制度關聯方式”<sup>②</sup>。人們乘坐交通工具，在把物品從一地運往另一地的時候，價格是按里程算的，而隨着快遞業的興起，送達時間的早晚，也會用不同的價格標出。所以，時間和空間都被標明了價格。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資本的運行可以通過“偷盜”工作日的方式來提高流動性。比如，在股票市場上，當天既可以在香港證交所做一筆“T+0”交易，還可以在閉市後用這筆資金在美國股市再做一筆“T+0”。這就等於通過時差“偷盜”了一個交易日，也可以說開發出多一倍的時間。

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化也給人帶來了時效性壓力，越來越多的事務必須立即處理，因為任何延宕都會造成不確定的後果，或者說，所造成的後果也許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處理。這樣一來，時間就成了一種壓迫人的力量，不是人在追逐時間的腳步，而是時間在驅使着人疾行。時間猶如一條鞭子，在人的背後抽打，讓人的腳步無法停下來。從人追逐時間到時間驅使人，不祇是人在與時間的關係中發生了地位上的變化，也是時間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資本主義的時間經濟中產生的高效率地利用時間資源的強迫力，會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深刻地並且大範圍地在佔優勢地位的時間實踐的形式和實質方面對工作人群產生影響”<sup>③</sup>。結果，被裹挾到這個過程中的每一

<sup>①③</sup> [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董璐譯，第252、195頁。

<sup>②</sup> [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李康等譯，第137頁。

個人都明顯感受到時間的緊張與日俱增。如果說，在農業社會，通信與交通是統一在一起的——在經由人力、畜力而實現的交通形式中，所遵從的是一種由自然界賜予人們也同時限定了人們的時間，而電報的發明則使得通信與交通分離了；之後，電話的出現，特別是信息技術、移動通信等，在建立起了完備的通信體系後，自然時間完全退出了人們通過通信而開展的交往過程。交通的發展也是如此。隨着動力的變化和提速，自然時間的約束越來越退縮到非常有限的地步。今天看來，通信與交通也經歷過分離又重合的過程。近代早期所實現的是兩者的分離，而在交通速度提升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又表現出了對通信的依賴，需要得到以通信方式構成的信號系統而對交通提供支持（如飛機、高鐵等）。這種分化、重組、融合的歷史，在時間上所實現的社會化要比空間上的社會化表現得更顯著。這一完整的過程，可以看作是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而持續展開的過程，祇不過在較長的歷史時期中沒有得到人們的充分重視罷了。到了今天，這種現象已經變得如此顯著，而且影響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至於無法再迴避對這一現象的關注了。

顯然，人們已經看到和正在經歷的是，在這樣一個運行、變化加速的社會中，個人受到社會的裹挾而被迫進入加速的進程中。“當有人放棄節省時間的技術，是要付出部分不同步的代價的，他不再能夠跟得上‘奔跑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之後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連接的機會，他因為時間方面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互動關係之外了。”<sup>①</sup>也許個人在主觀上並不想總是通過更換手機、計算機等來為自己節省一些時間，而且這樣做也會為自己帶來一定的經濟壓力，但是，如果他不去更換的話，一些軟件就無法安裝和使用，就會失去一些可能是預期中非常重要的關係，因而，他不得不換裝那些能夠為他節省時間的設備。然而，在他作出這種選擇之後卻發現，他的時間資源更加緊張了。正是整個社會中的幾乎所有人都陷入你追我趕之中，以至於所有人都強烈地感受到時間資源的稀缺。這種情況說明，即便時間資源的稀缺化不是宏觀社會問題，也是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事實上，它恰恰是一個宏觀社會問題，甚至是結構性的宏觀社會問題。

雖然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速度的加快為人們帶來更多的各種各樣的人生際遇，但是，這些人生機遇卻越來越具有轉瞬即逝的特徵，捕捉它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與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相比，當今時代的人們在生命歷程中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捕捉人生機遇上，這在主觀上也造成了一種時間緊張感。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的時代，“幾乎所有的知識儲備和財產儲備都面臨着不斷的過時的威脅。即便在行為者擁有自由的、不用做什麼事情的時間資源的那個時間段裏，他周圍的世界也在以飛快的速度發生着變化。隨着這段時間的流逝，行為者從很多角度上來看都處於落後的地位，並且因此就被迫要去追趕”<sup>②</sup>。這個時候，也會產生一種緊迫感，並強烈地感受到時間的緊張。有的時候，有些人也許會產生虛度光陰的懊悔感，並希望用高強度的工作去把那部分流逝的時間找回來。這些在時間上的主觀感受，都為社會時間塗上了一定的主觀性色彩。

時間資源的稀缺化，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問題。雖然從表現來看，這種稀缺化主要反映在個體人這裏，但個人所感受到的所有時間資源稀缺化又都能傳導到社會中去，從而使整個社會也處於時間資源稀缺的狀態中。即使人們都已感知到這種狀態，還會有一些人去製造時間資源稀缺的氣氛，特別是社會治理在程序合理性追求中造成的日益增多的繁文縟節，均在刻意製造時間資源稀缺化的氛圍。當然，就某些社會事項而言，特別是人們處在競爭狀態中，或者處在應對各種挑戰的時候，會感到因為時間資源的稀缺而造成緊張狀態，但這種“感到”並不是一種真實狀態，在社會的意義上是有多樣方式和途徑去彌補時間稀缺的。事實上，社會的時間資源是豐裕的，祇是

<sup>①②</sup> [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第186、159頁。

二〇一九年 第三期

個體的人無法把社會所擁有的時間資源轉化為個人所有，反而在社會時間越豐裕的情況下，就越感受到自己的時間資源稀缺。就此來看，時間是一種不同於任何一種其他資源的特殊資源，所謂社會時間的相對性也表現在這個方面。

當然，人們會說，在競爭的條件下，組織、民族/國家等社會存在物也同樣會感受到時間資源的稀缺。這確是實情，競爭文化以及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框架是在近代形成的工業社會的特有產物，或者說，在時間上與工業社會同步出現的組織、民族/國家等所有這類社會存在物都包含着一種可還原的邏輯，即可還原為個體的人。也就是說，組織、民族/國家等無非是個人的放大，它們所遇到的時間資源稀缺的問題，仍然是屬於個人的。個人的時間資源稀缺狀態會被帶入後工業社會，而且在工業社會的立場上會看到，時間因為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變得越來越緊張。但是，如果給予時間資源以充分的關注，努力去探尋解決時間資源稀缺化問題的途徑，也許是能夠找到出路的。一個可以考慮的思路是，如果在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積極地去改變時間結構，把既有的時間線性結構改變為網絡結構的話，也許就可以在時間結構的網絡化中找到緩解時間資源稀缺的出路。

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在時間資源變得稀缺的情況下，一些機構或部門反而對開發、經營那些耗費時間的項目投入了更多的資金和熱情。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社會治理至今仍沒有建立起時間意識，沒有意識到那些對時間資源的耗費在道德上是不允許的，甚至有魯迅（1881—1936）所批評的“無異於謀財害命”<sup>①</sup>之嫌。

## 二 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的區分

時間作為一種資源是在從自然時間向社會時間轉化中生成的，或者說，社會時間纔是成為資源的時間。自然時間是只能遵從的，人們不可能改變自然時間。不過，通過時間規劃和時間管理等方式，人們可以賦予和改變時間結構，並從時間結構的調整中去獲得更多的時間。比如，在集體行動中，通過分工一協作的組合方式使時間折疊起來，就使時間有了由人給予它的社會結構，進而使一條時間線疊加出了任意多條時間線。這時，所有通過時間疊加而多出來的時間線，都屬於人所建構起來的社會時間。因為，建構起了社會時間，自然時間就成了抽象的、理論上的時間了。也就是說，在人能夠改變時間結構後，人們實際利用的就是社會時間而不是自然時間。隨着社會時間的出現，它與自然時間的區別是：自然時間是純粹的量，社會時間則經常包含着人的價值關照。比如，人們會對社會時間作出有效性的評價，也就是去評估人們是否有效地利用了時間資源，會把那些無效的、低效的利用時間看作對時間資源的浪費。在資本化的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中，由於“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有效時間刻意關注，許多組織技術都是通過管理方式的不斷創新去提升有效時間和盡可能地把無效時間降到最低限度。

當人們所面對的不再是自然時間，而是處在由人的活動物化了的時間中的時候，雖然自然時間仍然是堅固的存在形態，但越來越隱藏到社會時間的背後了。如果在歷史中去看這個問題的話，會發現，在農業社會，人們所擁有的主要是自然時間，所謂“靠天吃飯”表達的既是對以空間形式出現的土地也是對“時令”意義上的“時間窗口”功能的認識。在工業社會，人們不斷地對自然時間進行改造，將它們轉化為社會時間，從而有了越來越多的與自然時間相對應的社會時間，也有了相互呼應的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通信技術的日新月異、交通的便捷化等，可以把社會空間變小，即把自然空間意義上的遙遠地方變得觸手可及，麥克盧漢（M. McLuhan, 1911—1980）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所說的“地球村”（global

① 魯迅：“門外文談”，《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6卷，第78頁。

village) 概念指的就是這種社會空間形態。但是，空間變小的秘密卻是隱藏在時間之中的，是社會時間使空間形態發生了變化，表現出來的是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的相對性。

由於人們充分體驗了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性，或許需要一種“社會相對論”來研究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相對性關係。比如，乘坐高鐵而不是步行時會看到，其一，似乎自然時間縮小了，而社會時間增大了，自然時間縮小的那部分構成了社會時間增大的那部分；其二，在有了速度的中介後，花費的自然時間越小意味着人佔有的自然空間越大；其三，社會時間的增大意味着社會空間的同比例縮小，社會時間越大則社會空間越小，所謂“地球村”就是社會時間較大的形態；其四，自然空間越大則社會空間越小，自然空間的無限大意味着社會空間的消失。不過，自然時間與自然空間的變化都是一種主觀感受，是相對於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而獲得的一種主觀感受。然而，這種主觀感受卻對人們進一步地去尋求改變時間和空間的方式、方法發揮着激勵作用，而且是可以製作成關於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的某種原理的，用以指導人對時間和空間的改造行動。

在這種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性中，是速度發揮了作用，是速度實現了自然時間向社會時間、自然空間、社會空間的轉化，並呈現出了這種相對性關係。從這種時間與空間的多重相對性中，可以推斷出社會時間的增大；然而，人們卻在社會時間的增大中越來越感受到時間資源的稀缺。原因在於，自然空間在轉化為社會空間時縮小了，使人們能夠佔據更大的自然空間，並能夠在更大的自然空間中開展活動，從而引發了時間資源的稀缺化，即社會時間的緊張。社會時間是時間的資源化。在時間實現了資源化後，也使空間社會化，並因為社會化而具有了彈性化特徵。因為自然空間轉化成社會空間後而使空間變得可大可小，也因為這種空間的彈性化，使得人們可以佔據更大更多的空間，或者說，把更大更多的自然空間轉化為社會空間。在實現了這種空間轉化之後，雖然在每一個心理維度上都反映出可以用更少的時間去佔據更大的自然空間，但卻因佔據了更大的自然空間而使社會時間的耗費增多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造成了時間資源的稀缺化。

在擁有了“自然時間”“社會時間”兩個概念後，可以看到，所耗費的是社會時間，而節約下來的是自然時間，並能再度轉化為社會時間和用於其他。也就是說，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是處在隨時變換之中的。凡是可能被作為資源加以開發和利用的以及被消耗掉的，屬於社會時間的範疇；而沒有轉化成資源的時間，則屬於自然時間的範疇。例如，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後，人們希望放鬆自己，或許會到茶館、健身房、郊外，花費一個上午的時間喝茶、聊天、健身、釣魚、躺在草地上曬太陽，這是一種主動的時間支配過程，意味着消耗了時間資源換得身心舒緩。相反的情況是，由於心緒煩躁不安，也同樣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什麼事也沒有幹，人們可能以為那是浪費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其實不是的。他一個上午什麼也沒有幹，這本身意味着他並沒有消費時間。祇是在他頭腦中浮現出了“浪費了”時間這個意識的時候，纔把那段自然時間轉變成了社會時間，並把那段消費時間的過程理解成了沒有合理支配時間而空耗了時間。如果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浪費了時間的話，那僅僅是自然時間的流逝，是一個與他無關的宇宙學或物理學問題。

與自然時間不同，“社會時間不是一種純粹的量，不能說其所有的組成部分是同質的，總是可以與自身來比較，並且是可以準確地加以測量的”<sup>①</sup>。社會時間的多樣性，意味着每一種類都有著獨特的質。雖然社會時間中的絕大多數種類是可以測量的，而且人們也習慣於通過測量去確定人們擁有和利用了多少社會時間資源，也基於這種測量去做出各種各樣的安排和開展行動，但是在社會生活和活動的意義上，當人們的時間意識浮現出來時，在人們“關於時間的判斷中，包含著對趨向、機會、持續性、穩定性、相似性等方面的考慮，被歸屬於時間間隔的相

<sup>①</sup> [英]約翰·哈薩德編：《時間社會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朱紅文等譯，第47頁。

同的價值並不意味着相同的測度標準”<sup>①</sup>。即便是同一種類的社會時間，也會在多角度的審視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同樣，在對社會時間的不同種類的區分中，也沒有固定的標準。在某個角度確認的某種社會時間，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卻可以歸類到另一種社會時間的範疇中去。即使不考慮社會時間的這種相對性，也會發現，不同種類的社會時間“在性質上的區別導致時間延續的相對價值，不僅依賴於時間延續的絕對長度，而且依賴於它們的品質及其強度。量上相同的時間長度在社會的意義上被看作是不同的，而不同的長度卻在社會的意義上看作相等”<sup>②</sup>。

總的說來，節省時間的技術給人的印象是壓縮了自然時間，實際上是創造了社會時間，使耗費的自然時間減少了，從而節省了時間。這說明，在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之間存在着相對性，創造和建構起來的社會時間越多，自然時間也就顯得被壓縮得越短。一般說來，節省時間的技術是通過速度的提升而去創造社會時間的。在獲得了社會時間的同時，使空間和時間都得到了相應的壓縮。對此，人們常誤以為或籠統地說時間發生了變化。實際上，就自然時間而言，並未發生變化，祇不過是人借助技術而使社會時間變長或變短。此外，人還可以通過管理等社會技術以及行動上的安排改變社會時間的結構，對時間進行折疊，從而使時間表現出複雜性。比如，在人們的感知中出現了時間節奏和流動順序的變化，即不再是自然時間所應有的那種狀態。這種變動性，也使空間呈現出新特徵：“文化方面和結構方面重要的空間特性在今天已經不再通過確定領域或地方的、固定的機制或固定的地位和位置來確定了，而是通過似乎是來回流動的、一再改變它們的方向和形狀的（如權力、資本、商品、人員、觀念、疾病、風險等的）流動或流量來確定了……”<sup>③</sup>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變化、內顫的運動特徵，社會時間是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和演進同步的。但是，在人類社會的很長的歷史時期中，社會時間亦如人類社會的其他構成部分一樣，有一個似乎是自然生成和自然演進的過程。社會時間應當歸於人的時間自覺，是因為人有了時間意識，並開始自覺地利用時間努力探索改造時間的方式和方法時，纔有了具有資源屬性的社會時間。隨着人的時間意識的生成，特別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現實需要的驅動下，自覺性的時間建構越來越成為人的行動和交往的一個必要的方面。在工業化、城市化取得了積極進展的時候，人們的時間觀念也得到了增強。在那些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歐洲諸多城市中，高懸時鐘的建築物一度成為城市的標誌。但是，當歷史行進到20世紀後期，那些原先讓市民引以為自豪的巨大時鐘卻多數被拆除了，不僅是因為人們不再需要它，而是因為其象徵意義與時代之間存在着衝突。也就是說，城市中的不同人群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時間，由時鐘代表的一個城市的同一時間與該城市中實際存在的多元化時間不合拍，甚至會讓人感到某種隱形的力量在窺視着多元化的時間，讓每一個有着自我時間的人和人群感到不安。

時間的社會化，即社會時間的生成，使得時間分類成為可能。人們根據社會生活的不同而把時間分成不同類型，諸如工作時間、休閑時間、交際時間等。這樣一來，人們實際上擁有了多樣化的時間。與人的社會地位相對應，越是成功者，所擁有的時間類型也就越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擁有時間種類的多少作為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但是，自然時間是一個常量，當一個人擁有的時間種類過多的時候，雖然他在社會時間的開發上可以實現最大化，可資利用的時間會遠多於自然時間，但同時又受到自然時間的限制。或者說，自然時間所構成的某個瓶頸又是他無法突破的，以至於他會強烈地感受到時間緊張。當然，擁有了多樣化的時間，也予人以在不同種類時間中進行選擇的自由。比如，人們可以在不同種類的時間中分出輕重而作出選擇，以求時間的功能最大化。由此，也就產生出了時間利用策略。因而，即便人具有多樣處理能力，也需要去進行策略性的時間組合，對那些他認為不甚重要的時間耗費進行壓縮。

<sup>①②</sup> [英]約翰·哈薩德編：《時間社會學》，第47、47—48頁。

<sup>③</sup> [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第256頁。

就個人而言，“存在於人的世界中的現實的、具體的和客觀的時間，首先是與他對生活過程的節奏的體驗聯繫在一起的，而生活過程是在與環境的關係中展開的；其次，也與他對集體活動的節奏的體驗有關，他自己的活動是在社會適應的過程中與集體保持同步的”<sup>①</sup>，這就是社會時間的個人形態——通過個人體驗形成了時間經驗和時間意識，並佔有了社會時間，從而找到行為選擇和開展行動的坐標。就此來看，社會時間在個人時間與自然時間之間發揮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說，如果不對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進行形而上學的區分，而祇去認識既有的時間結構，所看到的就是社會時間立於自然時間與個人時間中間，既有自然時間的客觀性又有個人時間的主觀性。正是因為社會時間的主客觀二重性，決定了社會時間的量在某一向度上的減少往往是在其他向度上的增長。因為，社會時間是聽從人的支配的。人可以把社會時間按所需處理的事項進行配置，從而使時間被分配到多個事項上並有了多個維度。人在每一個維度上因節省時間而表現出的耗時減少，也就意味着可轉移到其他維度上的時間的增多。在利用了諸如快捷交通、同步通信等手段而開發出了更多的時間後，就可以把節省下來的時間配置到需要時間去加以處理的其他事項上去。

### 三 時間資源稀缺化與社會治理

時間的社會化即社會時間的生成，也意味著開啓了時間功能分化的進程，從而使得時間複雜化。這樣一來，“複雜性的時間化顯示的是，通過將決定排列為‘一個接一個的順序，以可能比同時的順序實現更多的聯繫’，並且‘將選擇動作推遲，而當下的未來就像是蓄水池一樣，可以存放以後要做的決定’”<sup>②</sup>。從20世紀後期人類社會進入高度複雜性、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看，社會的複雜化是一個持續展開的過程。複雜化本身就是社會演進的趨勢，會隨着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而增長。所以，“複雜性的增加不會在這個當前的現在結束，並且未來的現在將通過從過去推遲而來的選擇決定和選擇的過量而背負額外的負擔”<sup>③</sup>。過去延宕下來而施予現在，而未來又正在展開之中。比如，在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全球化、後工業化歷程時，發展中國家仍肩負着工業社會治理模式建構的任務，以至於社會治理者不得不做出妥協。

這樣一來，就使社會的複雜性積聚起來。而這種複雜性的釋放，又必須借助於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來削減複雜性帶來的社會不平衡甚至矛盾。比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如果不被維持在持續增長的狀態中，就會遭遇各種各樣的矛盾爆發帶來的問題，結果是，“在內生的、內部系統所產生的加速的壓力之外，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的結構條件基礎上，也會出現其他的系統外源的加速要素，它使得加速似乎成為這樣的系統中的‘合理的時間體驗方式’”<sup>④</sup>。其實，這根本就不是一種“合理的時間體驗方式”，而是一種被迫的時間體驗，因為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速度稍微放慢，失衡立馬就呈現出來，矛盾就會爆發。更何況，外源性壓力總會在最不希望看到的時刻到來。這就迫使發展中國家必須在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中去消滅失衡和矛盾，而不是去選擇有針對性的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方案。

這也說明，在高度複雜性、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社會治理需要擁有更強的時間意識，需要根據社會時間原理去安排社會治理的事項，以求減少由於內外壓迫力而推動的、不自覺的、被動的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也就是說，社會治理者應擁有社會時間意識，認識到社會時間是功能化的時間，對社會時間作出功能分類，然後直接地針對時間的類型及其功能做出選擇。這樣做，與以往的以及現在仍使用的那種把社會治理事項放在自然時間中去排序、解決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我們區分出這樣三個要素的話（自然時間、社會時間、需要解決的事項），那麼，就會

<sup>①</sup> [英]約翰·哈薩德編：《時間社會學》，第33頁。

<sup>②③④</sup> [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第221、221、224頁。

發現，根源於傳統的問題解決思路是直接地在自然時間的線性結構中對需要解決的事項進行排序的。現在，隨着社會時間意識的生成，在自然時間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間又有了社會時間這一中介。這樣一來，那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就直接地是社會時間安排的問題了。如果社會治理者能夠在社會時間的安排上去增強科學性、合理性的話，儘管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卻能夠被納入自覺性的軌道中，或者說，社會治理者能夠對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進行調節和干預。

從人的思維活動史來看，人的空間感知要早於時間感知。如果說，人的佔有需求影響了人對世界的認識和選擇的話，那麼，也就能夠理解人的空間感知優先於時間感知的狀況了。當然，時間與空間作為客觀形態對人的感知器官構成了同樣的刺激，但人們更習慣於在空間意義上為所思的對象進行定位，甚至時間在人的思維中會表現出缺席的狀況。就人的思維是源於人的認識發生史來看，它是因為人對空間的佔有較為方便而引起的。與時間相比，人對空間的把握顯然要容易得多了，一切能夠為人所佔有的東西總是能夠激發起人的認識衝動。與空間相比，對時間的佔有要困難得多，是在人類文明史達到了某個階段後纔有了認識時間的要求。沿着這種歷史軌迹，可以說，工業社會的人們認識和把握時間的要求遠比農業社會的人們強烈。作為一個歷史性趨勢，它將意味着全球化、後工業化會把人類領進一個更加注重時間意識培養的時代。在思維上，人們有可能改變以往空間意識優先的狀態，代之以首先從時間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思維對象。這是因為，一方面，時間技術的發展使人能夠佔有和把握時間；另一方面，人們也發現對時間資源“富礦”的開發能夠帶來更多的收益。

在私人部門中，對時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走在了社會發展的前沿地帶。比如，出於資本增殖需要的時間資源開發和利用表現出了大步前行的狀況。其實，自工業化、城市化以來，或者說，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積極地開發和利用時間資源一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徑之一。在20世紀，隨着金融業的成熟，人們發現資本的流動性與利潤之間有着很大的關聯性。對於這種利潤，最為直接的解釋是在市場需求中取得的，祇有在探究這種利潤中的價值時，纔會引入剩餘價值再分配的原理。但是，為什麼流動性與利潤之間會保持一種正相關關係，具有信服力的解釋至今尚未出現。實際上，秘密恰恰在時間資源的利用上。也就是說，資本流動性的增強意味着在單位自然時間中佔用的社會時間資源更多了，即把增多了的社會時間轉化成了利潤。所以，當人們說“時間就是金錢”時，其實所指的就是以資源形式出現的社會時間可以轉化為以貨幣形式出現的金錢，是時間資源的兌現。

然而，在社會治理的領域中，人們仍然更多的是在空間的意義上去思考問題和安排各種各樣的事項的。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發生的“脫域化”運動，主要是人的生活和活動空間範圍的擴大，附帶地產生了時間意識；然而，在從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的“再脫域化”運動，雖然會被人們理解成民族/國家邊界的模糊化，但這祇是一種表面現象，深蘊其背後的實質性變革將是時間意識的覺醒。儘管人們當前仍在空間中去認識和思考問題，根據空間觀念和空間隱喻去安排各種各樣的社會事項，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與時間意義上的問題相遇。事實上，人們依據空間思維慣性去加以界定的許多問題並不具有空間特性，反而屬於時間範疇。比如，當人們說到互聯網空間、網絡社區時，腦中閃現的是一種空間意識，實際上，祇有從時間的角度去認識，纔能真正把握它們的特性。不難想象，當北京的某人在網絡上與紐約的某人進行交流和討論時，也許他們並不知道彼此所在的空間位置，而且他們也不在乎彼此在什麼地方。同班同學在同一個教室因為教授枯燥無味的課程而在網絡聊天室裏打發時間時，由於他們使用的都是“網名”而不知道就是鄰座。所以，空間至少在這種情況下失去了意義，代替空間而對人的行為、活動、生活等形成支撐的，顯然是時間。在這種現象普遍化的條件下，社會治理的空間基礎發生了動搖。如果再不轉向對時間的關注，確立時間意識並把時間意識轉化為思

維方式的話，就無法在這樣一個時間資源稀缺化的時代開展有效的社會治理。

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治理失靈，在新世紀中出現了諸多明顯可見的事例。例如，在20世紀後期，“新自由主義”提出的基本思路是，放鬆政府對社會運行的控制和干預，以緩和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是，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呼喚“鬆綁”所帶來的一波發展，卻似迴光返照一樣短暫。2008年，隨着金融危機的出現，也就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這也說明，面對社會運行、社會變化的加速，面對社會的高度複雜性、高度不確定性，如果不去考慮民主政治的時間約束問題，僅在方式、方法、運行機制上去進行調整，於事無補，而且對整個社會治理體系及其方式、方法都構成了挑戰。甚至，為了社會治理方便而設置的行政區劃，把辦公樓分隔成不同區域而限定不同部門的活動範圍等，都在受到時間意識的質疑。

從工業社會的理性和民主角度看，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帶來了社會治理的混亂和社會生活的庸俗化、思維的浮淺化、行動的浮躁化，“這使得在晚期現代的政治當中，解決未來的政策方針的，不再是（如果曾經有過的話）更好、更有利的觀點，而是群情激憤，或多或少非理性，但多半相對草率的直覺，煽動性的隱喻和圖像”<sup>①</sup>，但這又是人們不能不接受的現實；而且，人類也不可能再回到那個事事按部就班的理性時代，人們已經無法有計劃地安排所要解決的問題，無法去為未來安排一個可行的步步為營的時序。正如一個物體達到了一定的速度會漂行（例如，人們駕車出遊，當車速達到某個速度時，會有漂感）而着地不實，社會亦如此。

由於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的加速將會帶來更多更廣的社會亂相，同時，分析性思維及其理性模式又不能滿足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加速化所造就的新現實的要求，從而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令人所看到的都是負面因素，並引發人們的憂慮和恐慌。所以，關於社會時間的意識，也許是解決當前社會治理中各種各樣問題的一個切入點。確立起社會時間意識，從這種意識中發展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再基於這種新的思維方式去構想社會治理以及整個社會的建構方案，就能夠在全球化、後工業化運動中自覺地推動社會變革。如果說雜交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在海水中種植水稻而改變了人們只能在淡水中種水稻的思維定勢的話，那麼，基於社會時間意識去重建社會治理模式，也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思維和觀念變革。

<sup>①</sup> [德]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鄭作威譯，第75頁。